

# 译介学与翻译学: 创始人与倡导者

## —— 谢天振教授访谈录

张建青

(浙江工业大学, 浙江 杭州 310024)

**[摘要]** 本文是对著名学者谢天振教授的访谈, 话题涉及译介学及翻译学学科建设多个方面。谢教授期待时代语境的新变化能够促使中国翻译研究取得新突破, 他主张: 学科建设不能搞“大跃进”, 学术研究需要积极营造自由论争的学术氛围, 要注意引导学生培养三大意识: 即问题意识, 理论意识, 创新意识。谢教授还非常坦率地谈及其两大学术研究的遗憾: 一是其“翻译文学史”类著作未能真正达到其提出的“翻译文学史”的理想设想; 二在传播中国学术包括其自己的学术成果向外“走向世界”方面做得很不够。这也深含谢教授对年轻学者的殷殷期盼与嘱托, 期望学界很好加以弥补。

**[关键词]** 谢天振; 译介学; 翻译学; 比较文学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献编号]** 1002-2643(2014)01-0003-05

### Xie Tianzhen , A Founder and Advocate of Medio-Translatology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in China: An Interview with Prof. Xie

ZHANG Jian-qing

(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 Hangzhou 310024 , China)

**Abstract:** This is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Xie Tianzhen , a Ph. D. supervisor of Shanghai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and Fudan University. The interview covers the following aspects: the significance of Translatology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in China , the problems and solution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ranslation Studies as an independent discipline in China , the hot topics in present Translation Studies in China , the choice of thesis topics , research methods , etc. In the interview , Prof. Xie points out that he has two regrets in his research and hopes the young scholars can do much better in Translation Studies.

**Key words:** Xie Tianzhen; Medio-Translatology; Translation Studie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谢天振教授为享誉国内外著名比较文学专家, 翻译学学科的积极倡导者和奠基者, 译介学创始人, 国内第一个从理论上论证翻译文学归属问题的学者和最早论述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学者。谢教授学术视野开阔, 治学谨严, 唯真是从, 在30多年的研究与教学生涯中, 培养了很多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人才, 主持及参与多项国家级及省部级研究, 其著、编、译学术著作有50余本, 发表论文200余篇, 主要有专著《译介学》(1999)、《翻译研究新视野》(2003)等。下面是笔者压缩整理的2012年4月访谈谢老师记

录稿。

张建青(以下简称张): 谢老师, 您多年来从事比较文学及翻译研究, 国内外影响都很大。王向远教授称您为译介学及翻译学研究界的“震天”者, 确实并不为过。(王向远, 2008: 53)我们较了解您的都知道您懂多门外语, 尤其是俄语、英语, 还懂一些德语、法语和日语, 还翻译过一百多万字的作品, 只不过您比较低调, 很少谈自己的求学与治学经历。您能简要谈谈吗?

谢天振(以下简称谢): 首先呢, 王老师讲的“震

收稿日期: 2012-11-10

作者简介: 张建青, 男, 汉族, 山东单县人, 副教授, 复旦大学博士。研究方向: 儿童文学翻译、翻译文学史、译介学。

天者”其实是拿我的名字开个玩笑,不要当真。我只是在国内比较文学界和翻译研究界起步较早一点,知道我的人多一点而已。

我上外俄语系毕业,“文革”前的老大学生,1962年考入上外,正规学习二外德语两年,文革期间自学了英语、日语与法语。我1966年毕业,从1968年起做过11年中学英语老师。至于文革及后来经历我在与宋炳辉的访谈中已谈过一些,不再多讲了。(谢天振、宋炳辉 2008: 39-41)

张: 谢老师,作为国内比较文学和翻译学的领军人物,译介学的创始人,您的研究跨越了不同的领域,不仅在文学界、翻译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具体表现在“翻译文学史、文学翻译史”及“中国翻译史、翻译思想史”之类著作和论文大量出现;在其它学界如史学界、哲学界、政治学界、语言学界也有众多同仁学子借鉴了译介学理论,出版了“兵书译介研究”、“农书译介研究”、“外来语译介研究”、“哲学译介研究”乃至“某某书译介研究”、“某某人译介研究”甚至“某某词译介研究”等著述,可谓具有方法论的突破意义,译被学人,影响深远。您被学界公认是“国内译界少有的几位有理论创新的翻译理论家”(廖七一,2008: 50),在长达30年的翻译研究中,从跨学科的视角切入翻译研究,创立了独到的译介学理论体系,将翻译文学置于特定时代的文化时空进行考察,使翻译研究超越了“术”的层面而上升为一门显学。您是将“译介学”整理形成一种理论系统,并纳入比较文学的学科理论体系的人。(王向远 2008: 54)那么,可有根“吾道一以贯之”的红线将这些不同的研究领域串联起来?

谢: 我想“领军人物”、“创始人”、“奠基人”这些称谓于我来说太大了,实在受之有愧。我在译介学、比较文学、翻译研究这些领域,至多也就是有点小小的影响罢了。广州暨南大学曾有位青年教师问我,“谢老师,您对自己今后的学术发展有什么想法?”我当时很坦率,回答说“我此生最后也无非是写出那么一两本没什么人看的学术书吧。”作为学者,我对自己的定位非常清楚,我们从事的学问都比较“偏”、比较“专”,所以一定要“耐得住寂寞”。我没想到的是《译介学》后来竟然会那么受读者欢迎。

张: 这书内容在当时很新鲜,观点独特,视野开阔,受到欢迎也是很自然的。

谢: 人生中其实有很多偶然机会。当年就在我酝酿撰写《译介学》时,上外当时一位副校长有一天忽然给我打电话,问我想不想去加拿大访学。那是90年代初,出国机会极为难得,我当然想了。他关照我去外办拿表格,申请去加拿大做访问学者。我

拿到表格一看,发现距离截止时间只有两个星期了。申请表要求申报者做一个proposal,写明访学的目标和计划。我把目标定位在对加拿大比较文学研究进行考察和研究,这个目标对我来说是比较合理的:在此之前,我每年都给《中国大百科》写一篇文章,评说当年国内的比较文学研究现状。此外,我对西方的、苏联的、东欧的、港台的比较文学研究进行过梳理和研究,并写成文章发表。我把这些内容都作为前期成果填入表格,我的申请就具有了强有力的基础。幸亏当时加拿大驻华使馆的教育参赞,她是位教育学博士,看了我的材料很欣赏,并断定我能够完成预期目标。她难得亲自到上海来对我面试。面试一开始进行得非常顺利,所有问题我都应答自如,但当她问我关于加拿大的作家、作品时,我却傻了,因为我对加拿大文学确实知之不多。幸亏她接下来又问我关于加拿大文学理论的问题,我跟她大谈弗莱的原型批评理论,总算挽回了尴尬局面,还给她不错的印象。接下来她就问我“你准备什么时候去加拿大?”至此,我算过了关。

举这个例子,我是想告诉年轻人在项目申报的过程中,不可否认的确有些非学术因素起作用,但也绝非全然如此。首先要自己尽量做到最好,一定要在某些特定领域做出一些前期成果。文革时期讲究“政治面目”,如果说一个人“政治面目不清”,那是要命的事。今天做学术研究,也要讲究“学术面目”。一个学者“学术面目”一定要“清”。比如人家一看到你的名字“张建青”,就会想到你是做“儿童文学翻译研究”的,那就说明你在这方面曾有所贡献。这样,今后申报相关科研项目时,我不能说你一定会成功,但可能性肯定比较大一些。

加拿大访学期间,我研究加拿大比较文学之余,意外接触到当时最新、最前沿的西方翻译理论。这事可说偶然,但也是必然。偶然是我的这个契机,必然则是因为我的知识背景。我的知识背景决定了我发现多元系统论,发现西方翻译研究“文化学派”的代表人物的翻译理论。其他不具比较文学背景的人,看到多元系统论等当代西方译学理论,就未必会感兴趣。所以,我从比较文学,到译介学,到翻译学,背后有许多偶然的因素,但也有其必然性。你所说的“一以贯之”的红线,大概就是我从学生时代以来就形成的对翻译的兴趣。我对翻译一直怀有浓厚兴趣,一直在想,等我真正退休了,就翻译我喜欢的作品。

张: 这样说来,无论是您之前的兴趣,还是后来的学习,有方方面面的原因促使您走向后来的学术道路。除了外因,更重要的还是内因。首先您的研

究有兴趣做支撑、做动力,后面也就自然水到渠成了。因此,您由比较文学和译介学自然转向关注翻译学学科的发展,您也一直大力倡导翻译学学科的独立,最近更密切关注最新兴起并为体制接受的翻译学学科建设,还对翻译学尤其是 MTI 建设中的“大跃进”现象提出了严正批评。您近期在《东方翻译》发表了“学科建设不能搞‘大跃进’——对近年来国内翻译学学科建设的一点反思”(2011a)及“翻译学,何时才能正式入登教育部学科目录”(2011b),二文在学界和社会上都引起了很大反响。请再重点谈谈吧。

谢:关于翻译学学科建设,我在关注翻译研究领域之后,确实对它越来越重视。这也要感谢比较文学这门学科,我较早地参与、见证了比较文学学科建立的全过程。1982年研究生毕业后,我承担了创办国内第一本比较文学杂志即今天的《中国比较文学》的任务。创办杂志过程中,我跟季羨林、杨周翰、乐黛云等先生都有直接接触。这让我有机会了解了比较文学学科建立的全过程,对学科建设也有了比较感性的认识,所以当我看到翻译研究长期徘徊在学科体制之外,就很有体会。我几乎率先看到了问题所在,也就较早地提出要把翻译研究作为独立学科建立起来。值得庆幸的是,与此同时国内翻译研究界也有人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比如南京大学的许钧教授,广外的仲伟合教授,上外的柴明颀教授等等。另外还有一个偶然、却又是必然的因素发挥了作用,那就是时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长的李未教授,他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对他们学校的外语学科建设非常重视。他曾邀请我跟他见面,想听听我关于外语学科建设的建议。我就把我的想法告诉了他,提出“今天的外语学科建设必须把翻译学学科建起来”。他听后很感兴趣,也很赞成,就让我写封信把我的想法写出来,由他附一封他自己的信,一同转给主管学位建设的教育部领导。

我很快就写好了信。在信寄去两个星期以后,教育部有关办公室就给我打来电话,同时发来正式公函,对我的三条意见做了认真答复。与此同时,许钧教授等其他人在和教育部有关部门积极沟通。这样,几方面的因素形成一个合力,有力地促进了翻译学科的建立。

不过翻译硕士专业学位正式建立以后也出现了些问题,主要是最近几年发展太猛太快,这跟一些学校领导对这个学位点的意义和功能认识不足有关。他们把它看作一个普通的学位点,并没有意识到它是一个专业学位点,所以这些学校的实际教学与管理都与 MTI 学位点的要求和目标还有一定距离。

好在目前 MTI 教指委已经认识到了这个问题,正建立相应机制进行控制。

张:确实如此。一个新学科建立之后,必然会出现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作为长期关注翻译学科建设并促成翻译学科建立的重要学者,您对此是有感而发。

谢:是啊!我对翻译学科特别有感情,希望看到翻译学科平稳、健康、科学发展,不希望看到它成在我们手中,毁也在我们手中啊。

张:所以今年年初,您又在《中国翻译》发表了一篇呼吁性文章,即“新时代语境期待中国翻译研究的新突破”。该文对今天的翻译研究很有指导意义。您指出“最近30年,我们国家在翻译研究的理论意识的觉醒和翻译学学科的建设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突破,但仅仅是开了一个头而已。”(谢天振,2012:13)您指出:从历史角度来讲,我们已经进入以实用文献为主流翻译对象的第三阶段,宗教翻译与文学翻译已经边缘化。在进入第三阶段后,中国翻译研究要有新突破,应该特别认识到时代语境的新变化。(同上:13-14)

谢:时代语境的变化的是我们应该非常关注的问题。

张:您与时俱进,一直坚持理论思考的精神和勇气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王向远老师曾论及“您在阐发自己的理论过程中,伴随着很多激烈的学术争论。在这个过程中,您展现了理论家可贵的坚持的勇气”。(王向远,2008:55)我们还发现:您主持的会议往往给与会者留有这样一种深的印象:无论是您教的学生还是参加您学术会议的一些学者,不管哪个年龄段的,大家都有更多深度参与机会。年轻学人也能够感受到各方面的这些反响,他们往往说您的会议无门户之见,总是能邀请到各门各派来各显神通。会议议程安排也紧张有度,还能忙里偷闲,安排著名学者分组与青年学子交流。尤其是学术争论,不仅热烈而且友好。

大家还多次提到2009年秋金华会议。那次全国性会议,也有国外以及港台专家过来。在会上我们遇到江枫先生,他给与会的人都发了一篇很长文章的复印件,文中虽然没有直接点名说谢老师您,其实大家都知道他不同意您的主张,是公开批评您。他把反对您的主张写成文章分发给很多与会者。我们第一时间拿到这个都很吃惊,觉得可能您不知道,后来却发现您其实是知道的,又看到您仍和江先生一起亲切交谈,谈笑风生。会后大家私下都很感慨,觉得在这方面,您给后生学者很多言传身教的地方,很难得。

谢: 其实我一直主张学术研究需要正常的学术争论、争辩, 需要营造一种学术论争的自由氛围。这对于年轻学者的成长特别有好处, 所以我经常鼓励我的学生去看与我意见不同的文章, 鼓励他们去听不同的声音。我只要一听说哪篇文章跟我意见是不同的, 或者是批判我观点的, 就马上会告诉他们赶快去找来看。如果只有一边倒的声音, 年轻人是成长不了的。至于对我个人观点的争论、争辩甚至批评, 我觉得这里边也许有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是我自己对一些观点论述得还不够全面, 还不够严谨, 所以人家会进行质疑; 另一个原因也许是批评者还没能了解我是在怎样的层面上提出问题、阐述问题的。

所以我经常举瞎子摸象的例子。我说不应该嘲笑这些瞎子, 他们说大象像一根柱子, 像一把扇子。应该看到, 大象的某一部分, 确实像一根柱子, 像一把扇子。当然, 断言整个大象像一根柱子, 像一把扇子, 并且把它当作真理, 那就错了。我们每个人看到的其实都是一个局部。我们, 包括我自己, 应该意识到这一点, 认识到我们所知都是有限的。

张: 这让我想起古希腊阿波罗神庙门楣上的神谕“Know Thyself”。苏格拉底不也多次说过“最有智慧之人乃是认识到自己的智慧不值一提之人”(柏拉图, 2008: 255)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盲点, 老子不是早就指出“知人者智, 自知者明”么。研究者确实要明辨慎思, 才能养成求真通达的研究态度。

谢: 对。我也只是从我的立场出发, 就我看到的一点东西, 发表一点看法而已。那么你呢, 也是从你的立场出发, 写出你的看法。比如你从文学翻译的实践层面, 提出了一些问题, 而我则可能从译学理论的层面思考问题。这其实是两个层面的问题, 如果没有认识其中的这一差异, 那么对话时就会产生误解。譬如说江枫先生, 作为一位长者, 在翻译实践方面有一定成就的资深翻译家, 我是很尊敬的。

张: 您的尊敬我们切切实实看到了。

谢: 至于学术观点不同, 我们可以进一步讨论。我觉得作为一个当代学者, 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气度, 一个胸襟, 听得了人家的不同意见。而且呢, 说实话, 我还很欢迎有不同的意见, 针对我的一些著作也好, 文章也好, 一些观点也好, 我都很欢迎。这些意见, 一方面有助于我自己进行反思, 帮助我把有些问题阐释得更加透彻一些, 更加全面一点, 更加严谨一些。也有利于我的学生的成长, 兼听则明么。

张: 对做研究, 对于同行或者是竞争者乃至对于自己观点的“持异议者”, 表示感谢也好, 理解对方也好, 都是一个学人应有的气度与胸怀, 因为同行的支持、赞同、异议、质疑、论争, 其实都会促进自己思

考。就这一点而言, 学界也有些人就不是很宽容了。

谢: 但也有些人是很宽容的。譬如说罗新璋先生。我跟罗先生在《文汇报》、《中华读书报》上都发表过一些观点针锋相对的文章。讲学时, 我还当面对他的观点表达了不同意见。但罗先生根本不以此为忤, 仍然把我当作他的朋友。我去台湾开会, 他正好在台湾讲学, 他还掏钱请我吃饭, 还去买了音乐会的票子, 请我和我的朋友一起去听音乐会。对此我很感动。还有, 像南京的张柏然老师、吕俊老师, 都是这样的。观点不同并不影响我对他们的尊敬, 也没影响他们对我的友谊。我们是学者, 观点不同很正常。他们把我看作认真的同行, 我也发自内心地把他们当成自己的朋友。

张: 真正的学者不会隐瞒自己的观点, 也应该有胸怀将不同学者的观点, 甚至与己针锋相对的观点展现给学生。在研究和教学中, 这点很重要。那么, 您在教学和指导学生过程中, 是怎样培养他们特别是博士生和硕士生的学术研究意识的呢?

谢: 我对学生一直强调要养成三个意识, 一个是问题意识, 一个是理论意识, 一个是创新意识。每个学生, 不管在哪一个层面上的, 都应该确立这样三个意识。有人说提“创新意识”, 这个要求太高了, 做不到的。其实从另外一个层面上来说, 也是人人都能做到的, 就是鼓励学生对于一个问题加以认真分析, 通过深入思考, 刻苦研究, 找出自己的一得之见。而这一得之见来源于什么? 源于他的问题意识。做研究就一定是找到问题, 否则研究就是盲目的。怎么才能找到问题呢? 这就需要问题意识的训练, 需要充分占有跟所研究的对象有关材料, 仔细研读这些材料, 这是引发自己思考、最终发现问题的基础。

张: 只有这样, 才能刺激学生深入思考。问题意识有了以后, 才有可能产生创新的追求。能发现问题可能最重要, 比解决问题有时更重要。

谢: 理论意识也很重要。有的人很忽视理论, 觉得理论很虚、很玄, 有什么用呢。其实理论的最大功能就是帮助人们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譬如, 同样看待这个翻译行为, 有些学者包括有些长期从事翻译实践的人, 觉得翻译就是这么一回事, 怎么看也看不到翻译行为跟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 跟国际背景的关系。这就与理论意识的缺乏有关, 造成了看问题时的盲点。

张: 因此也就无法由小见大, 甚至视而不见。

谢: 对。理论会提供分析问题、观察问题与解释翻译现象的切入点, 让我们能够透过现象看到问题的本质。以译介学为例, 按理说我是在研究翻译, 为

什么我不提翻译学,而提出了译介学?这就跟比较文学理论、比较文化的理论有关。这些理论给了我一个大的文化视野,一个独特的分析翻译问题的切入点,从而让我能够发现翻译圈内其他人发现不了的问题,诸如文学翻译缺席鲁迅奖的事,中国文化如何才能有效地走出去的问题,等等。

张:角度一变,看问题就会发生很大变化,问题意识与发现意识也就凸显出来了。

谢:是的。有的人在批评中国没有得到诺贝尔文学奖<sup>①</sup>、分析中国文化没走出去的原因就是因为翻译的问题。这些人其实都没有抓住要害,没有看到问题的实质。

张:应该从文学、文化的跨国传播与译介的规律和特性角度去看。

谢:对,所以我特别指导了几个博士生做了些个案研究,如《红楼梦》百年英译史研究、“熊猫丛书”的英译研究,等等。通过这些个案研究,用具体的数据来说话,才说明问题。

张:是。我很想问您一个私下的问题:在自己的研究中,您有些遗憾吗?

谢:当然有了。因为个人才识、能力、时间、以及客观条件等各方面的局限,肯定会给自己的学术研究留下些遗憾的。回顾我这30年的研究道路,我觉得在两个方面存在着较大遗憾。

第一,我没有真正写成自己理想的“翻译文学史”。我比较早地提出了“翻译文学史”和“文学翻译史”概念,尤其是“翻译文学史”概念,认为真正的翻译文学史应该让读者不仅看到翻译事件,还要能看到作家、作品。但是说实话,我那本《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以及正在做的《当代翻译文学史》,都没能做到这一点。一方面因为篇幅局限,另一方面,真正做需要更多的专家和时间,要按照地区国别或语种来做,才有可能做到。这方面王向远的《中国20世纪日本翻译文学史》就做得比较好。

第二个呢,在把中国的学术包括我自己本人的一些学术研究成果“走向世界”方面,我做得还是不够。我们对有一些问题的思考,其实跟国际同行是同步的,特别在翻译研究方面。在翻译研究领域,尽管他们比我们起步稍微早了一点,但我们与他们相差并不大。我们现在思考的一些问题,有时候也不比他们差的。但我们总是关着门在国内发声,而没有很及时地去跟国际同行交流。这样一来对于我们中国的学术走向世界,其实是很不利的。我呢,因为关注国内翻译问题太多,也受到语言能力的局限,未能较多用外语特别是英语传播自己的学术观点,以扩大国际影响,这也就影响了我们的、我自己的学

术成果走向世界。其实很可惜。许多人看了我的研究成果以后,就觉得“哎,你这个成果应该到国际上去发出声音啊”。可是要发声的话,就需要把它翻成英文,需要到国际上去亮相。但这些都需要同时间和精力,以及纯熟的英语表述能力。这方面有的同行,像王宁教授,就做得比较好。

张:怎么样把我们这些标志性学术成果展现到国际上去,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的确很重要。这一块,恰恰也是青年学者可以认真去做的内容和研究的新领域。您刚刚谈到的这点,在某种意义上其实也是对年轻学者提出的殷殷期望。既然我们的翻译研究几乎与人家同步,甚至我们的翻译问题、研究意识、我们提出的原创性翻译理论和国外好多都是同步的,那么年青学者就应尽力把近30年来中国的重要学术研究成果翻译出去,介绍出去。

谢:是啊,我很希望年轻学者在这方面多做工作。

张:您这种声音通过访谈传播出去,就会激励很多学人自觉往这方面努力。相信您的遗憾会慢慢得以弥补的。多谢您接受这次访谈。

注释:

① 此篇文章是根据2012年4月访谈记录整理的。

参考文献

- [1] 柏拉图. 柏拉图著作集(第2册)[M]. 本杰明·乔伊特英译. 南宁: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 [2] 廖七一. 论谢天振教授的翻译研究观[J]. 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2): 47-52.
- [3] 王向远. 译介学及翻译文学研究界的“震天”者——谢天振[J]. 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2): 53-57.
- [4] 谢天振, 宋炳辉. 从比较文学到翻译研究——关于译介学研究的对话[J]. 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2): 39-46.
- [5] 谢天振. 学科建设不能搞“大跃进”——对近年来国内翻译学学科建设的一点反思[J]. 东方翻译 2011a,(2): 4-7.
- [6] 谢天振. 翻译学,何时才能正式入登教育部学科目录——对《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的质疑》[J]. 中国翻译, 2011b,(4): 4-8.
- [7] 谢天振. 新时代语境期待中国翻译研究的新突破[J]. 中国翻译 2012,(1): 13-15.

## 本期人物——谢天振

谢天振，祖籍浙江萧山，1944年3月生于上海，著名学者，国际知名比较文学家与翻译理论家，上海外国语大学知名教授，在翻译研究领域卓有建树，为译介学创始人，翻译学学科倡导者及主要奠基人之一。历任上海外国语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常务副院长等职，现任上外高级翻译学院翻译研究所所长，比较文学暨翻译学专业硕士生、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比较文学》季刊主编，《东方翻译》副主编，《中国翻译》编委，教育部全国翻译硕士专业(MTI)教学指导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暨翻译研究会名誉会长，上海市比较文学学会会长，中国译协理事兼翻译理论与教学委员会副主任，国际比较文学协会翻译委员会委员。享受国务院特殊专家津贴。同时受聘为复旦、北大、上海交大、川大、广外、川外、天外等十余所国内著名高校的兼职教授或客座教授。自1986年起，先后任香港中文大学英文系、翻译系、浸会大学英文系、加拿大阿尔贝塔大学比较文学系、俄罗斯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等校高级访问学者，应邀出席在美、加、日、韩、南非、巴西、俄罗斯、澳大利亚等国及我国港澳台地区举行的国际学术会议并做大会主题发言十余次。

主要编、译、著作有：专著《译介学》、《翻译研究新视野》、《译介学导论》、《译介学》(增订本)、《隐身与现身——从传统译论到现代译论》、《中西翻译简史》(合作)、《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1898-1949)》(主编，“九五”国家社科重点项目)、《中国20世纪外国文学翻译史》(两人合作，“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当代国外翻译理论导读》(主编)、个人论文集《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学术散文随笔集《海上译谭》，以及长、中、短篇小说及散文译作数种约100余万字。

谢天振教授是国内最早从理论上论证翻译文学归属问题和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学者，他提出的“创造性叛逆”的命题、他对编写翻译文学史的理论主张、对“中西翻译史整体观”的探索、以及关于中国文学、文化如何才能切实有效地走出去的阐释，在国内乃至海外学术界都有很大影响。据南京大学有关机构统计，其学术论著的被引用率在国内翻译界和比较文学界均名列前茅，遥遥领先于其他同行。



## 山东外语教学 (双月刊) SHANDONG WAIYU JIAOXUE

全国中文外国语类核心期刊

第35卷 2014年第1期 (总第158期)

2014年2月出版

主任	赵彦修
副主任	于涛 张彩霞
主编	张彩霞
顾问	戴炜栋 郭继德 黄国文 刘润清 石坚 许钧
主管	山东省教育厅
主办	山东师范大学